

新評論

第 三 期 半 月 刊



目 錄

論中國的計劃政治……………	陳之邁
政治思想與政治事業……………	陳石孚
國際宣傳的三個技術上的因素……………	王一之
英法兩國民族性格不同的比較研究……………	儲安平
比荷與歐局……………	太 因
秋行（散文）……………	端木露西
編輯後記……………	編 者

【本刊每期零售一角】
 【半年連郵一元二角】
 【全年連郵二元三角】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出 版

經 售 處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二 號

編 輯 兼 出 版 者
 新 評 論 社
 重 慶 來 龍 巷 三 六 號

本期文字由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給執字第一三六六號審查

論中國的計劃政治

陳之邁

近年來世界各國共同的趨勢，也可以說是時髦的趨勢，是在採用計劃的方式來辦事情。蘇聯的五年計劃可謂得風氣之先，其後希特拉的德國也有了四年計劃，從此各國便起而效尤，每一國都有計劃，每一國的人民都問他們的政府要計劃，於是計劃的政治便風行一時，無國無之。這是二十世紀的特殊情形，在從前是沒有人這樣做法的，我們處在這個計劃盛行的時代，也染上了這種風氣，無論什麼事情都有了計劃，沒有計劃的簡直就不像事情。例如國民參政會就問中央政府要計劃，整個的計劃，各省的臨時參議會也問省政府要計劃。我想將來我們的國民大會亦必問中央政府要計劃，縣參議會，鄉鎮民代表會，乃至於保民大會，甲民會議也都問縣政府，鄉鎮公所，保長甲長要計劃。這個世界本來是一個計畫的世界，我們處在這個狂潮之中自然得順應。何況辦一件事務先定一個計畫本來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我們不當人云亦云，不加思索地亂學人家。這件事有相當的重要，值得我們冷靜地分析，細心的研究。

西洋十九世紀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紀，在那個時候一切都任憑個人的自由，除非萬不得已政府不加干涉。當時自由主義者，在新興工商業發展的初期，最注意的是經濟事業上的自由，在這個範圍以內政府尤其不應當干涉。這件事本來

有極悠久的歷史背景，十九世紀初期的發展不過是這一串事實自然的演變。

自從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的政權照例是在貴族僧侶武士和地主的掌握之中。他們所經營的農業的利益在工商業興盛之後與工商業者的利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在這個衝突之中，工商業者所提出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社會中的自由。我們可以說是：政治方面是民主主義，經濟方面是資本主義。那時產生了許多的理論學說為這種主義辯護，亞當斯美士的正統派經濟理論是其中最出色的。經過多年的競爭，英國以近代工商業發達最先的國家實行自由主義最早，選舉的改革與自由貿易的成就是自由主義勝利的標誌。選舉的改革使得英國的政權不復為貴族地主所壟斷，而開放於有資產的工商業者。自由貿易的實行廢除了地主們所擁護的穀律，使得在英國出產的農產品不受關稅的保護，外國價廉的食物可以自由輸入在市場內競爭，使得工人的生活可以比較廉，物品的價格比較低，資本家的利潤比較高。這兩件大事物使得自由主義大獲全勝。

這次的勝利引進了空前的繁榮。在十九世紀當中英美等工業國家的經濟發展是空前的，尤其是在廣漠而資源豐足的北美。每一個人都從事於生產事業或商業的經營，具有本領

的或幸運的都成鉅富。同時，各方面競爭異常激烈，演成種種劇鬥，大的所謂托辣斯漸次形成，壟斷市場。當時說是保障人民的自由，事實上資本薄弱的只得任人宰割。

工商業這種發展，一方面固然使得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增高，但同時也有種種不良的影響，例如經營農業者之受壓迫，資本薄弱者之被吞噬，勞工大眾之被虐待等等。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工商業發展之漫無標的，各地不平衡的發展，以及不數年即發生一次的經濟恐慌。英國資本社會的演變就可以看出它有種種不合理的，不均衡的發展，尤其可以了解所謂經濟恐慌（例如一九二九年後的恐慌）是如何嚴重的事情。這種惡性的循環真好像是火山的爆裂，在極短促的時間——幾個星期，幾天，或幾小時——就可以將一個銀行，一家公司，一個人，由鉅富而變為赤貧。這種的情形太不合理，太危險，太不適宜於人生，是近年來一般的感覺。針對着這種情形，一種有計畫的經濟社會理想漸次形成，一般的人期望着政府出來把這件事情矯正過來，就是犧牲一些從前以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由亦在所不惜。第二個羅斯福近七年來所辛苦經營的就是如何的可以對於美國經濟畸形的發展予以一種合理的管制，一方面使得一九二九年以來的大震動可以得到救濟，一方面使得將來不再有了這種的事情發生。美國的社會是傳統的自由主義社會，羅斯福的復興計畫事實上遭遇到許多的窒礙，究竟他的努力達到了多少的成功現在是不能臆斷的，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他用心方向是計畫地來管制美國的經濟社會，矯正自由主義所造成的惡果，導引美

國的經濟走上比較上合理均衡的大道。在他的復興政策下他制定了許多的計畫，合攏起來也可以說是一個整個的計畫，雖則國會與大理院不時與他的意見相左，使得他想做的事情不易完全做成。

俄國的情形與此迥不相同。俄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但却是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俄國的幾個五年計畫是一種發展經濟的計畫，而不是一種矯正經濟社會畸形發展的計畫，如同羅斯福的一樣。俄國在先根本沒有多少的工商業可言，因此在開頭的時候就可以為有計畫的發展。俄國的五年計畫自始便是以經濟的發展為中心的，它的目標在根據國家的需要，地理的環境等等，對於經濟發展的各部門為一種合理的安排，使得它們能夠彼此銜接配合，以免畸形的不均衡的發展，如同在自由主義之下那種情形。

在俄國辦這件事情有許多估便宜的地方。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雖然也曾滲入過俄國，但一直到十一月革命，俄國仍然是一個專制國家，一般的人民智識低落，同英美等國迥然不同。而在十一月革命以後，在政治組織的理論上，它是無產階級的獨裁，是領袖的政治。一般的人民是無參政的權會的，但是人民是社會主義的信徒，沒有受自由主義的喧染，極端願意接受政府的統制。事實上因為以前大多數的人民均以業農而生，對於工業的發展根本沒有經驗與智識，也勇於接受這種新的理論。所以俄國的幾個五年計畫，可以次第的迅速完成，達到了計畫經濟的目標。

希特拉的德國近年來也有一套的四年經濟計畫。德國的

情形自然又與美俄不同。德國是一個工業極端發達的國家，近年來的國策是極力謀求在戰爭期間海岸敵敵封鎖時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德國的四年計畫是以此為其鵠的。以希特拉在德國的神威，計畫的推行自然是不會有任何阻礙，除了人力無法補救的事情以外，一切都可以用政府的力量推行順利。而德國的人民自始不會接受多少自由主義的空氣，不反抗政府來使他們自由，對於政府指揮一切的局面也認為是天經地義，不必懷疑。於是四年計畫就可順利的進展，希特拉在獲得了奧國及捷克以後也將德國本身所缺乏的資源大部分補充起來，使得它的自給自足理想可以大部分實現，可以開始戰爭而無懼。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一點是應當為我們所深切了解的。無論那一個國家近年來所制定的計畫都是以經濟為其中心的，其它政治上的部門，內政、外交的各方面，都沒有包括在內。這一事實并不足以說明它們這些國家在內政外交各部門裏完全是沒有計畫的；它只是指出近來風行一時的計畫是以經濟的發展為其中心，全副精力就貫注於矯正或避免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思想所造成經濟社會發展種種畸形的不合理的狀態。

根據於這個背景我們來探討中國當前計畫政治的情形，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件事我們注意的是中國現行的計畫是無所不包的，大致以國民政府為其範圍，行政院有行政計畫，立法院有立法計畫，司法院有司法計畫，考試院有考試計畫，監察院有監察計畫，軍事委員會有軍事計畫，

中央研究院有研究計畫等等。但是因為行政與軍事究竟是一個國家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比較上惹人注意。當然，這些計畫是絕對秘密的，政府是不能公開發表的。除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以外，一般人民是看不到這種文獻的，因此也無從批評。

其次，我們在這個時期雖然開始極端注意經濟建設，經濟計畫則僅為行政計畫中的一部分，并且并不比較別的部分特別惹人注意。這就是說，我們的計畫，雖然也有經濟的部分，但却不以為之絕對的主體，其它行政的部門似乎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更進一步說，我們的經濟計畫是包括在行政的部門之中的，着重點似乎是在經濟的行政，而不一定是以經濟的業務為主，因此我們所看重的是管理經濟事業不是辦理經濟事業。

就這兩個特點來看，我們的計畫所包羅的範圍比之任何國家為廣，裏面綱舉目張，五花八門，只要有一個機關就有一部分計畫，添一個機關就多一部分計畫。我們的計畫，換句話說，是以政府的機關為準繩的，并不是以事業為準繩的，因此這個計畫也就不能以某一種事業為中心，如同別的國家以經濟為中心一樣，雖則我們有了一個經濟部便不得不有一部分計畫舉到了有關經濟的事情。我們可以不必去說明這種辦法是否最妥當的辦法，我們的用意只在標出我們計畫政治的特色。

別的國家的計畫，我們說過，是以經濟部門為主的，美國的復興計劃，俄國的三箇五年計劃，德國的四年計劃，都

是以經濟為唯一的目標，其它內政外交部門都不包括在內。然則別的國家對於經濟以外的事情是否完全沒有計劃的？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問題，可以分開幾方面來說。

先談外交。外交同外交行政不同，後者只是照例的事情，最多只有點滴的改善，沒有什麼多少了不得，外交却是十分重要的。究竟外交應當如何的運用，不但要看本國的立場，還得去看國際環境的演變。到了今日，我們應當明瞭國際環境的變化是不可預測的，因此「外交計劃」是不可通行的一個名辭，而現在的所謂「外交計劃」根本就是「外交行政計劃」，其中包括的不過是增加些使領館經費，調整外交行政機構一類事情，真正大的問題是誰都不敢寫在計劃之內的。因此我們即便希望有計劃，有的東西是不能辦到的。

至於其它的部門，一般的都有計劃的可能，雖則也有許多事情是不可預測的。例如衛生機關可以計劃一年或數年，但是如果忽然有了瘟疫，它不能說計劃中沒有，因此不去救治，水利機關也不知道那一年有水災，寫在計劃之中。此外，別的事情大都有計劃的可能，有計劃地去辦比之隨興之所至去辦自然好些。

在別的國家當中，這種有計劃可能的事情它們也不列在計劃之內（計劃只講的是經濟的事情），而列在預算之內。在政治上軌道的國家之中，每一年的預算就是每一年的行政計劃。政府辦事情是一定要用金錢的，要辦一件事情就得準備一筆經費，沒有這筆經費不能辦這件事情。例如英國，每一年度將終了時，各行政部門就編製概算，列出它們所

要辦的事情，並且說明每一件要辦的事情需要多少經費。各部門的概算一概送到財政部去，讓財政部看看英國政府究竟有多少收入可以担负這筆支出。如果入不敷出，是否有的事情可以不辦；如果非辦不可，有什麼方法可以開源或節流，然後製成總概算，送到內閣會議去決定，最後提出國會去通過。坐在辦公室裏想辦應辦的事情是稍具常識的人都做得到的；問題在通盤的籌劃來分別緩急先後，收入多的時候多辦些，收入少時只得選擇最迫切的來辦。政府可以不必去費心思研究根本沒有錢來辦的事情。所以在英國，以及一切政治上軌道的國家，每年度的預算就是每年度的計劃，凡是列在預算內的事情都是有經費來辦的事情。這樣使得計劃與預算打成一片，也可以說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

我們的情形却與此大不相同。我們的計劃與我們的預算，是根本脫節的，是完全兩件事情。這個現象是可悲的，反映出我們還不知運用近代政治上計劃與預算制度的兩個方法。我們擬定計劃時是不問財政部有無經費的，我們編製預算時是把計劃放在腦後的。預算是一年一度的，我們的計劃有的是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二年、三年的。計劃與預算在我們看來是兩件事情，一個機關寫在計劃中的事情到了要辦的時候會發現它沒有辦這件事情的經費。於是這個機關就去請求追加預算；有的追加成功，有的失敗。成功的時候它可以依照計劃進行，失敗時就只得不辦。二十八年我國追加預算竟達預算總額三分之一。這種現象是上軌道的國家所不應有的。同時我們各種計劃裏項目有許多並沒有辦。這也是不

應該的。

其實據我們觀察中國政治實情的結果，政府機關大都很願意多辦事情，很勇於做事。至於所辦的事情是好是壞當然是另一問題。現在有一個機關專管考核政府各部門有沒有將計劃中之事做完。這種考核可以說是多餘的，因為我們當前的問題似乎不是政府做事太少，而是它想做的事情太多，把政府重要的事情耽誤了，把金錢用於無益之途了，過於加重人民的負擔了。中國現在是以一個中古式的經濟社會負擔二十世紀戰爭的責任，我們的人力物力都有限制，是不應當用之於眼前不易獲得效果的用途的。所以中國政府的行政計劃，弊病不在不完備，而在於太完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計劃與預算脫節的局面，結果是計劃不像計劃，預算不像預算。這倒是一個嚴重而值得研究的問題。

在中國現在而談計劃政治還有一個問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是常開全體會議的，這種會議照例有許多決議案交政府執行。同時，國民參政會也每半年開會一次，也照例有許多建議案交給政府執行。這些決議案照一般講來都是極有關係的事情，政府自然應當照辦，但是因此就產生了困難。決議案所說的事情，如果政府已經辦了，也列於計劃中了，自不成問題。問題在它們是不會為政府所注意到的事情，忽然在一個年度中間提出要辦。政府如果每年要辦許多計劃中

未曾列入的事情，現有的計劃便是白費的；辦這種事情所需的經費自然不在預算之內，預算也就成了騙人的文書。政府如果不辦這些事情，或留待另一次擬計劃預算時再行列入，則政府又難辭懈怠之咎。好在這種情形僅是臆想的，因為據過去實際的經驗而言，這種議決案大都是政府已經在辦理的，或政府根本沒有方法辦的。舉兩個例來說，近來有人建議政府在一縣成立一個優待出征軍人家屬的組織。這件事政府早已通令辦理了，建議的人似乎不知（至於辦得好壞是另一問題）。近來又有人建議政府每一縣至少設立托兒所一所。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情，建議的人沒有想過今日中國的財力物力與人力是否容許政府設立一千多個可以裨益社會保持兒童健康的托兒所。由此而知我們所刊心的問題暫時還不嚴重，但在政治機構與運用的觀點看來却值得考量，否則所謂計劃，所謂預算便都成了虛飾。

總之，中國目前政治的計劃有許多特點，與別的國家都很不相同。我們的計劃是包羅萬象的，是不限於經濟發展的。而尤其特別的是計劃與預算是不銜接的，寫在計劃中的項目不一定能辦，也不一定就辦；在預算以外仍然有許多并不一定必要的開支。我們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將來可以逐漸的改善，否則所謂計劃便成了點綴品而已。

政治思想與政治事業

陳石孚

近代心理學家，把人類分作兩種，一種是向內發展派 (introvert)，一種是向外發展派 (extrovert)。前者好靜，後者好動。前者沈默寡言，後者活潑靈敏。前者宜於研究學問，後者宜於建立事功。前者為思想家，後者為事業家。

我們考察古今中外的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共同原則，那就是：以學問見長者不必有事功，以事功見長者不必有學問。換言之，思想家不得兼為事業家，事業家亦不得兼為思想家。以學問見長的思想家，是屬於向內發展派，以事功見長的事業家，是屬於向外發展派，這兩種人的性情、稟賦、興趣和能力，不僅各不相同，而且絕對相反。因此，世界上一切的個人，不是屬於甲派，便是屬於乙派，沒有任何人可以同時屬於甲乙兩派。

我們現在單就政治而論，就可以證明這種情形是無可否認的。西洋政治思想家，古代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近代如洛克、霍布斯、盧騷，最近如狄龍、拉斯基，他們都沒有任何事功可言。政治事業家，古代如亞歷山大、凱撒，近代如路易十四、拿破崙、俾斯麥，最近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斯達林，他們都沒有任何學問可言。我國歷史裏的人物，也是一樣。政治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孟子、荀子、顧炎武、黃宗羲，他們都是一些純然儒者，並未建立甚麼烜赫的功勳。

政治事業家。以君主而論，如秦始皇、漢高祖、漢武帝、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以大臣而論，如蕭何、韓信、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郭子儀、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他們並沒有甚麼精深的政治理論，可供後代學者探討。從此可知政治思想和政治事業，是兩種顯然不同的活動，從事於政治思想者，即不能從事於政治事業，從事於政治事業者，亦不能從事於政治思想。

這種意見，我國古代早已有人道過。左傳上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疏謂：「立德，謂制垂法，博施濟衆，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如禹、稷。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如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屈、宋、馬、班，制作子書，撰集史傳文章皆是。」此處所謂立德立功，即事業家之成績，所謂立言，即思想家之成績。事業家和思想家，都是偉大人物，其影響所及，皆可亘萬世而不滅。他們的地位，本無高下之分。但是我國無論在政治或個人方面，素來注重實踐，不尚空言，因此便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三個等級。照着這個次序而論，事業家的地位，乃遠在思想家地位之上。從上面所講的各點看來，可知一位思想家，假使他真能

發現一種獨到的理論，自然可以躋於不朽之列，正不必棲棲遑遑，去與事業家爭一日之短長。同樣，一位事業家，倘若他真能為天下興利除弊，自然也可以躋於不朽之列，正不必東施效顰，去與思想家作學理上的爭辯。近代獨裁國家，如德意志和意大利，就患了這個毛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分明是兩位才幹絕倫的事業家，但是他們偏要把國社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看作一種高深的理論。他們應當不以思想家自命，勇往直前，去趕那動天地，泣鬼神的政治事業，那就更加可以顯示他們人格的偉大。

一個政治事業家，假如想完成他的使命，只須以國利民福為前提，並不需要一種大而無當的理論。倘若只有一套空洞理論，而沒有貫徹那個理論的實際方法與決心，必然仍舊毫無效果。

國際宣傳的三個技術上的因素

王之一

宣傳的技術方面，有三個因素：即事實的因素，時間的因素，和心理的因素。必須把操住這三個因素的神髓，運用得宜，然後方能構成正確的宣傳技術。這三個因素的運用，在「國際」宣傳方面，尤值得加意探討。這裏筆者想各就這三個因素的一般原則，加以論述；然後就大戰以來各國國際宣傳技術的先例，論其得失；最後擬就我國國際宣傳技術的取捨，略進一言。

一、事實的因素

事業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是毅力和眼光，學問雖有相當的輔助功用，然而那並非必需的。劉邦和朱元璋，本來不通文理，但是他們終久成為創業垂統的君主。由此可見事功和學問之間，並沒有相互的聯帶關係。

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倘使一方面要研究學問，一方面又要建立事功，那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再進一步講，我們根據近代心理學家的分析，知道人類的天性，本有向內與向外發展的區別。設若要叫一個人向內外兩方面同時發展，那便違背了人類的天性，決沒有成功之理。這個道理，是近代心理學對於政治社會的一大貢獻，我們明白這層道理，就可以知道如何發展各人的特長，去為社會盡責任，為國家謀福利。這是有教育之責者，所應特別注意的一點。

一般認為宣傳的效用，受限於「與事實吻合的必要」。這就是說，宣傳必須有事實的存在，然後方可根據這一事實作為宣傳的資料，不可拿全係子虛的事實進行宣傳。因為長期看來，妄造事實的宣傳，必遭敵人的反噬之害而無法擺脫，失去宣傳上的信用而無法挽回；容可收利於一時，必將遭害於無窮，決不是好的辦法。能幹的廣告家，可以把一種品質低劣的雪花膏，說得如何好的天花亂墜；然而不能說用煤球做的雪花膏，可以擦在臉上，使皮膚白嫩。希特勒曾經在

「我的奮鬥」裏指出，德國大戰中的宣傳，一口咬定敵人爲「荒唐可笑」是沒有多大效果的，因爲德國人民發現，敵人的「荒唐可笑」一點，完全不是事實。大戰中協約國方面的失敗宣傳，莫過於說德國軍餓死者的屍首以煉取肥油，以及說德國軍隊比利時兒童的手指堆積如山等類的偽造故事。最近在西班牙戰爭之初，納粹政府曾經完全否認德國有供給富明哥軍火與「志願兵」之事。但在二年之後，希特勒却公開大言不慚的說明，德國對富明哥的援助，達到了如何重大的程度。又如近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德國尚說沒有吞併捷克的意思，但於不旋踵間，却完全違反前言。這種前言不顧後語，與事實絕對不符的宣傳，長期看來，有利無害，必須竭力避免。

然而宣傳受限於客觀事實的說法，祇是就「長期看來」而論，若在某一特定場合下，祇求宣傳一次而一時收效起見，完全虛偽的宣傳，也可以發生效力。有時宣傳的效力，真可以指鹿爲馬而使人信其爲馬，以白作黑而使人信其爲黑。本來，宣傳便是「社會授意的啓示」，爲明瞭「社會授意」力量的偉大，可以引證一個伊索寓言上的一個故事。故事說，一個老者肩負一頭死羊，準備回家煮而食之。一個人想要騙他把這頭羊丟下，而自己拿來喫用，便雇用了十個小孩，分立在這一人經過的路上。第一個小孩先說道：「老頭！你橫一條死狗作什麼？」老者聽了之後，完全不睬，因爲他自己明明橫的是羊，那裏是狗？走不遠，第二第三第四個小孩也都說他橫的是狗，他逐漸有些惑疑了。到後來經過十個

小孩，都說他橫的是狗，他便真個信其爲狗，而把它丟掉了。這一故事引用於宣傳上，便可表示因社會授意所在，真可以完全使個人意見失去作用，這表示宣傳運用到了妙境入化的程度。歷史上欺騙宣傳最成功的例子，便是英國一九二四年的那一次選舉。當時英國民衆頗有投票選舉工黨候選人之意，乃保守黨突於選舉的前夕，發表了一篇偽造的第三國際對工黨的訓令，文中唆使工黨進行暴動，發動流血革命，結果遂使工黨在選舉中完全失敗，保守黨獲得了勝利。及至以後證明這是一個偽造的文件後，選舉期間已過，無可挽救。這是虛偽宣傳的成功之例。然而這種例子，祇能作爲例外，不能視爲宣傳原則，因爲在一國進行宣傳時，不能如上述之例，僅求宣傳一次，必須繼續的宣傳下去，而在長期宣傳中，便不能偽造事實，以陷入謊言遇狼的牧童的運命。

宣傳雖不可不顧事實的真假，但在技術上，可將半真半假的事實，認作全真的事實來宣傳；可抓住一件細微事實，誇大其詞的宣傳；或僅據事實的一面，取其對我有利的一點來宣傳。這樣，可使敵人對於這一事實的存在，無法全部否認；若敵人不能完全否認事實的存在，而徒從解釋事實的真像或其他方面來辯護，則適足予聽者以狡辯的印象，不能使人置信。首先得這種宣傳技術的妙用的，便是大戰時英國宣傳其參戰的理由，爲保障比利時的中立，爲條約的神聖而戰。因爲事實上比利時的中立，確實遭受了德國的侵犯，德相柏特曼荷威(Bethmann-Hollweg)確說過「條約是一片廢紙」，那麼儘管實際上英國的參戰理由全不在此，而英國必

欲藉此顯明事實以爲參戰理由，自可光明正大的說出，使德國沒有適當的反駁餘地。

在我國的國際宣傳上，筆者鄭重指出，我們要妥善運用宣傳的事實因素。遵守客觀事實，是我們當前宣傳的箴言。即如我們的戰報「八股」，什麼「我軍戰敵逾萬……」，「某地已無戰略價值……」，「是役我軍有壯烈犧牲，敵軍傷亡尤倍於我……」，「敵機盲目投彈，多落荒郊，我無損失……」之類，運用一套公式化的宣傳，都應當竭力避免。若因軍事理由，一時不便宣佈戰事真像，也應當在事後有一篇詳細而正確的敘述。本來，妙用事實因素的宣傳，不在隱藏去真消息這一點上，而在怎樣呈現出這個消息這一點上。關於戰報的宣傳方法，大戰時有許多成例可尋，這裏一時不能盡言。又如敵機轟炸我國大都市的消息，在國內宣傳上，雖不必過份描寫其慘痛之狀，藉以減少國人的怯敵心理；但在國際宣傳上，却仍要擴大的宣傳出去。譬如我們對外宣傳敵人殘殺我平民數百人，則敵人縱能在國際上狡辯，謂我死傷不過數十人；然數十與數百，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間，世人所得敵軍殘暴的印象，毫末能減少，徒見敵人每提及一次，越發增加世人對敵軍殘暴的一番回憶而已。

妥善運用宣傳上的事實因素，是宣傳技術上的主要一

者。

二、時間的因素

對於一件事實的宣傳，更須注意其時間性，要找準一個

恰當時機來宣傳。一件事實，如果若沒達到聳人聽聞的時機，則該項事實縱然如何千真萬確，如何對我宣傳上有利，也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反之，同是一件事實，若恰在引人極端注意的時機宣傳起來，便可發生高度的宣傳價值，能發揮最大限度的聲訴力量，能博得宣傳上的國際市場性，能有超出原來的實在價值的重要性。

例如大戰時威爾遜的十四點宣言的和議主張，倘若在歐戰初起時，德軍正在節節勝利的兩星期內提出，便絕對不能對德國人民有一點聲訴力量。因爲那時候的德國人民，正夢想着「一戰而滅亡法國，再戰而稱霸歐洲，以爲攻下巴黎祇是旦夕間事，主宰世界的願望，正可一朝實現，還聽什麼折中式的和議條件？唯因威爾遜這十四點的和議主張，是在戰爭的末期提出，正在德軍幾次大進攻失敗之後宣佈出來的，所以能使德軍憧憬在這十四點的和議基礎下，覺得沒有戰敗者與戰勝者之分的和議，還可以考慮，強似自家戰敗而結果更將惡劣的好。所以這種和議和主張，正在這樣恰當的時機提出，纔對於德國人民發生了莫大的聲訴力量，而發揮了絕大的宣傳價值。

我們的國際宣傳，也應當根據這種時間性的原則，來作最技巧的運用。例如在歐局初安世界人士正注意武漢戰場的時候，在英國正致力於簽訂空中協定的時候，更在國際反侵略大會召開反轟炸大會的時候，拿出敵機空襲武漢死傷我平民若干的事實，向世界上廣擴的宣傳出去，便謂之抓住了時間性的宣傳因素。反過來說，倘若在中國沉寂的時候，倘若

世界上驟然發生一個重大問題，把中日問題的重要性完全籠罩住的時候，再來宣傳敵軍的暴行，便算已失去這一事實的國際市場性了；縱然這時敵軍的暴行比前一時期更有增加，而世界人士的注意力也要減少了，我們的宣傳效力也要減退了。

對國策的主張，也應當要審擇時機來擴大宣傳。例如在敵軍進攻海南島時，便是宣傳中國為世界和平而戰的良好時機；謂中國之抗戰，乃為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實質上有如替英美法荷各國作抗日先鋒，乃所以截止暴日的侵略野心，藉以奠定世界和平基礎。又如如敵人在敵方禁止外商航行長江時，正是宣傳中國戰勝與世界福利這一份理論的時機；謂暴日甫經佔領一部中國領土後，便將中國門戶封鎖起來，若待其佔領全部中國領土之後，豈有不把中國門戶全部封鎖，而排斥外商於中國之外之理？再如抗戰轉入第二期之後，正是宣傳中國必勝的恰當時機，謂中國誘敵深入之目的已達，大舉殲滅倭寇之期不遠，定可取得最後勝利。凡此，都是利用時機從事某部分宣傳之例；機警的宣傳家，應當時刻把握住這一要點。

恰當運用宣傳的時間因素，便是我們當前的國際宣傳上所最應致力的一點。

三、心理的因素

宣傳必須針對對方的心理而發，不可憑空說教。就稱對宣傳上有學術貢獻的希特勒，曾說宣傳與科學探討不同，宣

傳是為大衆的，而科學探討則專為智識階級的。實在的，宣傳並不是發明學說，闡揚真理，可不顧人性偏見，祇求超時間超空間的事物真理；乃是為達到某種暫時目的起見，求其一時為我的話所迷醉，至於這種話是否合於真理，是否能歷百世而不變，則不是宣傳家所注意的。大思想家的學說，往往在他生時遭受各方非難與揶揄，直到他死後方纔成名；這種「僥倖」，不是宣傳家所要幹的。所以成功的宣傳，「必須針對一般普通承認的價值而發」，必須根據人類已有的偏見或心理的弱點而下說詞。

在任何一个地域內，都有該地居民的種種人性偏見存在；有民族的偏見，職業的偏見，社會的偏見，個人的偏見等等。宣傳家之所事事，便是要把這些偏見，都觀察而體驗出來，然後清理出來一個人民的「激憤水準」，最後依照這一水準製訂宣傳策略，必須這樣製訂出來的宣傳策略，方能展開宣傳的聲勢力。譬如外國到中國來的傳教士，決不張口就說中國人敬奉祖先與崇拜孔子等事為荒謬不經；必須先說崇拜祖先是應當的。然後再轉過來說耶穌是世界人類的祖先，應當儘先加以敬奉；更必須先說孔子是偉大的，然後比較說來，孔子還有不如耶穌之處，或者說他們二人之間有些什麼不同，而結論到敬奉耶穌的必要上。我們作國際宣傳，便應當善師此意，而作「見什麼人說什麼話，說出的話要播着對方的心靈播處」的努力。

上次歐戰中，各國對於各該國的戰爭目的的宣傳，便極盡迎合每個人心理的能事。譬如對於社會主義的人士，便把

戰爭的目的說得如何高尚理想化，可使「一向知有革命不知有國家」的社會主義分子，如法國的赫威(Herve)等人，都由激烈主張國內社會革命，一變而發出愛國的呼號了。對於虔信宗教的人士，便說這一戰是宗教上的神聖戰爭，以致使德法的天主教徒，都分別在他們本國的旗幟下，去完成上帝的使命了。甚至對於音樂家，也說這一戰是英國音樂與德國音樂的決鬥。這樣，這一戰爭的目的，纔能適合國民每個人心理，使戰爭變成大衆化，使戰爭成爲人人之事，使每個人心理中都感覺這一戰爭有他自己的一份兒。

我們當前的國際宣傳，便要極端注意外國人的心理，而善加利用。例如空襲一事，便是歐美各國人民所最恐怖而最討厭的一件事，以敵機空襲中國的暴行，來向國際上宣傳，最爲迎合外國一般市民心理。對於這種暴行的宣傳，不但能引起英美法蘇各國人民對日本的莫大反感，即便德意等國的一般市民，也要對敵軍發生極度惡劣的印象。再就外人心理把這方面的宣傳技術檢討一下，又可發現出許多宣傳上的妙用。譬如在我們遭受敵機空襲的城市中，若拿出小的城市來宣傳，比較不易引起外國人的注意；如爲大的城市，或爲外國僑民所居住的城市，用以向國際宣傳，則可引起外國人民特殊的注意。在我們的空襲損失中，不可拿出我們政府方面的損失來宣傳；必須拿出我們人民的生命財產的損失來宣傳，方能使國際人士對我發生同情。尤其要盡量宣傳學校、醫院、教堂等文化團體與宗教團體，如何遭受敵機狂炸的慘狀，方能喚起他們的憤慨心理。更進而把外國人經營的學校、

醫院、教堂等，如何成爲敵機轟炸的目標，用爲國際宣傳材料，纔更能引起其痛恨暴日的心理。

作國際宣傳的材料，和作國內宣傳的材料不同。在國際宣傳上可將中國士兵甚或人民死傷千萬的事實不提，而單將外國傳教士一二人慘遭敵軍毒手的事實，來特別揭揚出來，作生動的故事描寫，以爲宣傳的主題。對國際宣傳的主張，也和對國內宣傳的主張不同。在作國內宣傳時，我們可以說中國抗戰是爲民族生存與獨立解放而戰；但在對國際宣傳時則必須說中國爲正義與和平而戰，將宣傳的題目「大同化」，「世界化」，方能對外國人民有聲訴力量。試觀最近各國都在高倡各種國際「理論」(Ideology)，如蘇聯所提倡的「和平不可分」(Indivisiibility of peace)，德國所提倡的「世界原料再分配」(Redivision of raw materials)，英國所提倡的「和平改變」(Peaceful change)等等理論，都在加重指出它們並非爲一民族一國家謀利益，乃以世界福利爲前題。戰後德國反對凡爾塞條約的宣傳，都不以國家利益爲言，而以普遍正義相號召。國際宣傳的一個原則，便是要針對「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的心理，以倫理爲出發點，以利他主義爲言。這是世界各國的國際宣傳家所普遍感覺的；而我們以弱國抗戰的地位，更要極度奉行的。

正確運用宣傳的心理因素，是我們在國際宣傳上所最須破除工夫來研討與實行的。

英法兩國民族性格不同的比較研究

儲安平

在過去前後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之間，英國已兩次聯合法

國，和德國從事廣大的戰爭；這完全是出乎英人本願的行為。就英法德三國的民族性格而言，英人的性格近德人而遠法人；這在研究英國國民性的書籍中可以證明，在英國社會觀察英人爲人做事的實際生活中也可獲得這樣的結論。羅馬帝國的國境，北以萊茵多腦兩河爲邊陲，所以遠在彼時，萊茵河南岸的文化生活，即已分歧。萊茵河的南岸因受拉丁文化的薰陶，文物政制日見昌明，而北岸的日耳曼民族則仍滯留在遊牧的原始生活之中。四八一年，克羅維斯 (Clovis) 入主法蘭西，開始了強大的法蘭克王國，而近代歐洲的德法兩大強國，亦由當時這個法蘭克王國孳乳而生。但這個王國終受地理底自然律的支配，入居羅馬高盧一帶的西法蘭克人，從其所征服的土民習得一種駁雜的拉丁語，日漸化于羅馬，而本居萊茵一帶的法蘭克人，則仍保持其原有的日耳曼語言。在文化低下的時代，語言上的不同，每能在政治上發生極大的影響，而當時這法蘭克王國亦因語言文化的各異而趨於分裂。查理曼大帝一死，高盧境內拉丁化的克勒特及法蘭克兩族，自成一體，是即今日之法蘭西，而介於萊因河及斯拉夫民族之間操日耳曼語言的民族，又另成一體，是即今日之德意志。德法兩國從查理曼帝國分崩之後，即各

自分道，直至今日。

羅馬帝國的軍隊官吏亦曾盤據過不列顛島土，但羅馬人之入據不列顛，其目的在統治而非征服，故一旦羅馬的軍隊自英土撤退，羅馬帝國在不列顛的文華政制，亦即蕩然無存。史家論羅馬帝國遺留英國的僅有三事，即倫敦大城，羅馬官道及基督教。但那教在英國的發揚，仍是日後之事，其間且經過數百年的間斷。所以今日之英人，不論其語言文化以及思想的方法，很少受拉丁文化的影響。盎格魯薩克森族與日耳曼族原比隣而居，在血統上幾可說是來自一源。今日英人的性格及英國許多傳統的風俗政制，有一部分仍自日耳曼族沿襲而來。今日英人之愛好運動、賭博、飲酒，和日耳曼人完全一樣。古時日耳曼人最崇奉婦女的真操，最忠貞于皇，今日英國亦是如此。古時日耳曼部落中，皇無專制的霸權，其權力均受限制，這又是今日英國虛君制度的來源。今日英人之重實踐與德人之勇于行，尤堪媲美，英人德人可以共同生活，而英人法人則格格不入。英人的沉着鎮靜與法人的狂放熱情完全相反，英人之祇重利害實效與法人之傾心真理原則尤各別。凡與英人曾經相處者，類有一種印象：英人對法人輕視厭惡，而對德人敬佩畏懼。讀近代歐洲外交史的人，都知道在十九世紀末葉，英國曾幾次企圖聯德抗法，

一九〇一年年底才決定放棄這個企圖。凡爾賽條約簽訂以後，德國人民的困苦，曾引起多少英人內心裏的同情，這是希特勒執政以前英國扶德抗法的另一個心理上的因素。但是在國際間的糾葛太縱橫錯綜，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害終於超過了一切，遂使第一次大戰的血腥祇乾了二十年，這英法兩個姊妹民族又復重見於疆場。

作者於一年前曾寫過一篇文字，分論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三國人民的性格；本文擬就英法兩國國民性格的不同，作一次綜合的比較研究。

X X X

英國國民性裏最主要的一點是重實踐、重行動；法國國民性裏最主要的一點是重思維、重原則。行與思是英法兩國人民活動中的軸心，從這兩個不同的軸心所發揮出來的兩國人民的一切發展，不論在行動方面，思想方面，或為感情方面，自然表現不同。英人重行，追求事實的效果，法人好思，憧憬抽象的法則。思想原須賴有智慧，而法人在智慧上，以及在想像的能力上，其天賦誠比英人為高。法人的神經遠比英人尖銳，他們富於推論思維，愛觀察宇宙。他們常想從變化萬端的人生現象及自然現象中，找出若干法則，使宇宙間一切事與物都能歸納之於此若干法則之中，並以此若干法則為其活動發展的規範。一旦發現自然界裏有不能歸納于已有的若干法則之中的現象，法人便運用其思考上的天賦，在邏輯的規律之下，求新法則的製訂。

法人因要以一法則來規範萬事，所以一方面須將事理物

類分別清楚，一方面在思維的行程上，須求其合于邏輯合于科學。這兩者都須要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正確」(Precision)。所謂「正確」，乃是一種智慧上的鑑別能力 (Intellectual separating power) 的結晶，而這種「分別」，又可分為三類。第一種乃是將某一事物其本身所包孕的許多原素分別開來，是謂分析 (Analysis) 譬如用一個圖表，將一部機器的每一部分都繪摹出來，並將每一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予以明白的解釋，同時並不因鑑別這一部機器的每一部分而毀滅這部機器整個的美與整個的體系。第二種乃在使這一事物從其最接近或最相似的事物裏，挑拔出來，給予它一個非常正確的解釋，而使它與其他不易混合，這就是通常我們所謂的定義 (Definition) 要給每一事物以一個它所獨有的地位。第三種就是分類 (Classification)，因為法人既欲將一物一事之理，應用於其他一物一事之上，所以對於宇宙間的事物，必須有極科學的分類。分類如不正確或無嚴密的組織，則以一法則規範萬事，勢難執行。凡上所述，皆是法人運用智慧，遵守邏輯，透過思考作用的結果。

英人則不同。英人祇重行動，不重思想。一切純智慧的活動，英人以為瑣碎不足道。法人的精力因為大部分化費在思想的運用上，對於行的方面，不免顯得軟弱弛懈；同樣，英人因為祇注重實踐，所以智慧上的開發，便受了很大影響。英國除詩以外，其餘在戲劇小說繪畫音樂建築彫刻等，都退居人後。而英國法律祇能適用於一部分事件而不適用於一切事件，尤為英人缺乏思維能力，不能在複雜的事理中找出

單純的原則的一個最好說明。一切玄學在英國亦不發達，二百五十年來英國的形而上學家祇有浩布士、洛克和斯賓塞三人。論者謂英國一切思想中以經驗主義 (Empiricism) 為最有光輝，而經驗主義的發達，實仍說明英人是重行的民族，因經驗乃從行動中得來，英人信賴經驗，不會說英人信賴實行。

思想是有規律的，可以推論的，生命則變動無常，不易逆料。所謂生命，就是「一串行動的延續」。世人常稱英人為最不邏輯的民族，誠以生命中的遺遺，原難都合邏輯；當生命的活動不能與邏輯的規範一致時，英人常捨抽象的法則而從實際的變動。因為不守理論，唯以實利依歸，所以前後各事，便難遵守同一規律。英人不合邏輯的例子，舉不勝舉。

譬如英國中央政府有十幾個部，有的部稱 Ministry，有的部稱 Office，海軍部長叫 Lord 而外交部長叫 Secretary of State；大不列顛帝國版圖內的屬地的名稱更是五花八門，政府的式樣也各不相同。而英國文字本身就是最不邏輯的文字。英人的目的因為祇在實用，任何事物，祇須其不妨礙實際的運用，即由它存在。英人在動作時也一往直前，祇顧與動作直接有關的一切，而避免其他抽象的或智慧的思索，正如蜜蜂採蜜，直接飛入花叢之中，它只知達到它的目的，而不復顧及在花叢中一路飛過時的一切靈感，這就是英人所謂的一「實踐感覺」(Practical sense)，而「實踐感覺」和「邏輯」是常常不能並存的。

英國的中央政府，在並世各國的中央政府，其事職最少，相反，法國國內的一切事務，大都直接由中央政府支配。這

也可以用英法兩國的國民性來解釋。我們都知道英人有三種特殊的能力，即組織能力，合作能力，和自治能力。這三種能力幾乎可說是英人的天賦。英人因為重行重實踐，所以頗都能遵守自己的本份，負責理將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好。他們賦有自然的組織能力，也是重行的一種表現，因為組織就是一種行動。英人又因想像力薄弱，所以對於理論的爭執，不甚堅持，在團體裏可以犧牲自己的意見，放棄一己的意見是團體合作很重要的條件。Volney 曾述一個從前英人法人在美洲從事殖民工作的故事，說英人早餐後，丈夫叮囑妻子在家做那幾樣事情以後，彼此即分頭工作，一天光陰，毫無虛擲，而法人夫婦，則在早餐後，兩人商量今天應做些什麼事情，彼此意見總不易一致，結果爭論了整天。這是一事未做。可見如各人固持自己的成見，團體合作，勢必渙散。英人因有此三種天賦才幹，所以英國有許多地方事業，都由地方人士，自動起來籌辦，不須中央政府費心。譬如現在英國國內所有的慈善事業，兒童保育，動物保護，以及其他教育事業，中央政府很少過問。至於法國之所以全國事業俱由中央政府支配，實是法人愛好規律的一種結果。法人將任何事情都納入一個事前設計的計劃之中，並將全國一切相同的事情，歸納於一個相同的秩序或制度之內。法國是一個講計劃講秩序的社會，全國各項事業，俱由中央管轄，即如教育藝術等，也由政府主持，所以法國學校裏的教員，也列為政府的公務人員之內。

因為英法兩國的國民性不同，英法兩國的教育精神也不

同。運動在英國的教育裏佔極重要的地位，英國在運動中造就人才，英國的政治道德也在運動場上養成。而運動者，乃是百分之百的一種行動。法國教育的目的，則在發展智慧，法國教育以智力教育為中心，希望每一個學生能獲得一門專門的智識，同時培養他們對於愛好知識，愛好文化的習慣。

在海外殖民，英法兩國的作風也不相同。英國是重現實的國家，所以他在海外注意的不是名譽，不是光榮，更不是什麼文化的傳佈，而祇是實際的利益，所以英國殖民的性質是經濟的，他注意當地資源的開發，市場的擴張，原料的攫取。英國在殖民地上的統治人員，其注意的對象，是物而不是人——或者即使是人，其觀點的角度，也是物質的，而非文化化的或宗教的。但是法國就不同，法人因富於抽象的想像力，所以便追求榮譽，法人常愛在海外發揮武功，企圖建立強

比 荷 與 歐 局

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比利時廢止了她一八三九年以來的中立制度，除受凡爾賽和約和國聯盟約的保障外，一九二〇年並與法國簽訂軍事協約，一九二二年再和英國締結英比協定；但這個協定終受英法分歧的影響，未生效力，一九二五年羅迦諾公約成立，英義復同意保障德比之間的邊疆。戰後比國的需要，不是中立的恢復，而是安全的保障。自主的

大的帝國，我們在法國的歷史中，可以得到例證，路易十二和法蘭西斯第一都憧憬於建立一個軍事的帝國，亨利第四便向着這個憧憬邁進，而路易十四終於實現了這個夢想。其後法國革命再準備來一個強大帝國，此強大帝國復於拿破崙未覆沒前一度實現。而拿破崙亦常滿懷熱情，想將法國革命的精神，自由平等博愛，帶給他軍旅所到的國家，以發揮法國無上的偉大的文明。

×

×

×

本文題目，長可寫成一書。今既祇寫五千字，所以祇能一述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同時比較材料也未能充分利用。但有一點應在此說明，即吾人謂英人重行，法人重思，初非謂英人不想，法人不行，祇是謂某一民族對某一點特別側重，特別顯著而已。

大 因

中立本是十九世紀荷蘭的主要政策，荷蘭雖未參加大戰，但戰後她加入國聯，願意負擔為國聯會員國所應負擔的一切義務。當時有許多荷人，覺得他們過去的中立政策，已不合時代的潮流，而信仰國聯可以給予她們安全。美國雖未加入國聯，但美國素來是支持和平的柱石；德國雖滿懷戰敗的憤恨，但一九二六年德國也終於加入國聯，所以當時的歐洲政治，充滿了友善與光明。

但這種光明的憧憬，祇是曇花一現。九一八以後國聯的

因循猶豫，並未能給予一般「小國」何等刺激，但國聯對義大利經濟制裁的失敗，却在歐洲土地上開始撤下了疑慮和不安。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突然進兵萊因，英法終于未能有一點具體的行動；處與英法德三大國之間的比人荷人，心理上遂起了極大的變化。同年七月，荷蘭及其他「小國」，發表了一個聯合宣言：國聯既不能保障她們的獨立，她們因亦無意參加任何國聯決議的行動，即使是執行國聯決議案的任何國家的海軍陸軍，荷蘭也拒絕允許在她領土上通過。同時，荷蘭也拒絕接受任何一方面的保障。荷蘭半官方面有某一部人士，曾謂那些「提議中的西方互助安全公約」中的國家，可以認為：如有任何一國侵略了荷蘭的領土，就等於侵犯了她們自己的領土一樣。但荷政府對於這樣一種辦法，也無意參加。因為深恐如有此種規定，則在最危急的時候荷政府決定政策時，在心理上容易受其影響，任人民輿論方面，也足以減低自主獨立的精神。在性格和氣息上，荷人本近英而遠德；從歷史上看，荷蘭在危急的時候，支助她的也常是英國。但是論及國家的利益，荷蘭最聰明的政策還是絕對的中立，因為她是一個貿易國家，她的商務關係遍及全球，她需要和每一個國家通商，和每一個國家維持友好的邦交，而不宜與任何一方面締訂同盟。荷蘭國內的國社黨，最初曾企圖使荷人傾向德國，但這個企圖，顯遭失敗。其後他們又設法運動使荷蘭保持一種有利於德國的中立，但此點亦無成效，因為荷政府認為真正中立，無所謂「有利」於任何一國。

希特勒既斷毀羅迦諾公約，進兵萊因以後，其餘四個羅

迦諾公約簽字國英法義比，先後集會於巴黎倫敦。當時法國決心以武力來維護條約，但英政府和英國全國輿論，對於用武力去干涉「德人收復德人的土地」，表示反對，倫敦會議的結果，祇是對德屈服，這使比國大為失望，而其對於本身的安全，開始焦慮。那時歐洲列強，都全力擴軍！和約中對德國整軍的限制，一年前早經德國自動廢止。國際的聲威，自德日退盟後，實已江河日下。而在西班牙內亂中，民主與獨裁形成了兩大對壘，比國既不同情德義，復因宗教的關係，仇視蘇聯，對於蘇聯的法國，亦極不滿。在這種國際環境之中，比國終覺還是以恢復中立為上策。比王李波爾第三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作其即位以來在國務會議中的第一次出席，發表一篇歷史的宣言，宣佈比國回復中立。他這個宣言曾引起當時歐洲政界裏極大的震動，但經過外交上的努力，英法終於同意比國擺脫其在羅迦諾公約中的義務。

但是比國這次的中立，在實質上和比國在戰前的中立，略有不同。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英法普等國事前磋商，公佈比利時為永久中立國，一八三九年荷蘭被法所敗，退出比土，簽訂倫敦議定書，比國的中立，經英法俄普奧的共同保障才算正式成立。中立雖曾給予比利時七八十年的和平生活，如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時，比國即未遭受蹂躪，但那次的中立，祇是列強的一種命令，事前並未獲得比國的同意，所以當時比國人提出抗議，認為這是一種侮辱，損害比國的主權。但這次比王的中立宣言，完全是一種自由的行動。前比國總理及外長齊爾，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份「外交事務季

刊」上發表的一篇「比國最近外交政策之目的」一文裏，對此曾有所論述，他說比王那此的中立宣言的中心，是「獨立」與「平等」。現在比國對英法固無任何束約，但如比國一旦遭受他國之攻擊，英法對比仍有軍事援助之義務；但比國是否願意接受英法的援助，其權則操之於比國。

英國在歐洲大陸上有兩個基本政策：一個是均勢，一個便是防止比荷落入于任何第三強國的控制。歐洲各國中，沒有一國有如英國那樣關切比荷的安全。在過去，每次任何強國企圖併吞比荷時，英國總挺身而出，甚至不惜用武。法國大革命時，普奧謀出兵干涉，而英國則希望法國能早日恢復秩序，甚至準備承認其革命政府。但一七九三年以後，英法終以干戈相見，直至一八一五年才終止者，其引火的原因實為 Scheldt 河問題。在一六四八的 Westphalia 條約中，規定荷蘭有權控制其領土內的 Scheldt 河的航行，而法國則于一七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要求此河必須由他國船隻自由出入海口。同時法軍已近勃魯塞爾，法軍如越勃魯塞爾而達 Antwerp，則法國顯可控制 Scheldt 河之入海口。此河之入海口不容由另一強國控制，為英國自愛特華特三世以來之傳統政策，因為此河如一旦落入另一強國之手，則泰晤士河以及英國極長之海岸，均將受到嚴重之威脅。整個的十九世紀，英國的政治家對於比荷問題，都極密切注意，在維也納會議上，英國企圖使荷比合併，用以阻止法國的野心。後來英國這

個目的未能達到，她又反對以法國親王來承繼比國的王位。一八七〇年在普法官戰與開戰之間，俾士麥發表了拿破崙第三的駐德大使 Benedetti 企圖吞併比國的手筆，全英輿論大為震動，格拉斯頓立刻採取緊急措施，邀約普法雙方担保不破壞一八三九年的對比保證。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德的外交關係極密切，甚至有締結同盟的可能，但後來英法終于攜手對德了，主要的原由固由于英德在海軍上的競爭，但也由于英國認為德國之勝利，即為德在比國及 Belgium 沿岸之永久佔領，甚或吞併荷蘭，且在一九〇六年二月，毛奇也曾有過如此表示。而這種可能，自為英國所懼怕。誠以英國本土與大陸，僅相隔一水。近代科學上的發明，使此種距離，更為縮短，英國為顧全其本國及其海岸的安全，對於比荷的前途，自更關懷。奧斯丁張伯倫撰文論述英國的外交政策時，他這樣說：「低流國家（即比荷）的獨立是英國極注意的；她們的邊疆就是我們的邊疆；他們的獨立影響我們的獨立；她們的安全和我們的安全不可分割。」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西門爵士在下院演說，稱：「今日比國之完整對於英國之安全及利益，與過去無異。這是一個地理的事實，而無物可以變更之者。」同月三十日，包爾溫也說：「我們大家不要忘記：自從航空發達以來，我們從前的邊疆業已失去。當你想到英國的國防時，你不復再想到杜佛，你想到萊因。我們的國防就在萊因」。

自從二次歐戰爆發以來，世人都在懷疑：是否德國將破壞比荷的中立，借道萊因，進攻英法？五個月來，比德荷德的

邊境，時地時緊。在一月中旬，謠言囂熾，傳德國在德比荷邊境集中大軍，同時比荷也採緊急措置。其後情勢稍緩。但二月九日北京哈瓦斯電稱，據邊界消息，德國又在鄰近比國邊境的亞琛城集中軍隊，較原有駐軍增加六師至十師之衆。我們根據常識的看法；如西線戰事果將認真進行，恐怕德國終須進攻比荷。試看歐洲電訊，二月十日戈培爾在柏林向各中立國記者發表談話，其言有云：「以中立國而論，德國對於各中立國均願予以尊重，但矯僞的中立國，則爲德國所反對。緣國家與人民乃二而一而二者，有國于此，揭棄中立政策，而聽任外國勢力所左右，對於德國蓄意出以敵視的表示，是即矯僞的中立。」此項談話，顯係對比國而發，也可視爲德國侵比的預留借口。我們認爲如戰事果將認真進行，德國恐終須侵入荷比者，有兩個理由。第一，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實在太強固，軍事專家都認爲不易攻破。麥克奧斯特拉斯堡之間的一段，其堅強程度，恐用幾千輛坦克車進攻，也不易突破。新聞報道有一次曾傳希特勒準備以一百萬人進攻馬奇諾，但德軍的統帥部內，對於這樣重大的冒險，素持反對態度，並且化一百萬人是否能夠攻破，而攻破了馬奇諾防線後，是否就算獲得勝利，仍是疑問。比荷邊境雖也

有防禦工事，但和馬奇諾防線一比，到底軟弱得多，所以德國爲了軍事上的理由，很可能的攻入比荷，當然瑞士也同樣有被侵危險。第二，任何一國所以不敢破壞比荷的中立，無非顯忌英法兩國出來予以比荷以武力的援助。現在德國的戰爭對象既直截地係英法兩國，則此種顯忌，已不存在。同時我們也可看到：一，德國進攻比荷之時，就是西線大戰真正開始之時。至于比荷中立遭受破壞後，英法將立刻駛援，當爲不成問題；二，德國這次進攻比荷，未必能如上次大戰時德國攻入比國的那樣容易。比荷這幾年來都有軍事的準備，雖和德軍的進攻力，還不能相比，但至少可望有相當的抵抗。另外，一月十八日北京合衆社有一個電報，也足引起注意。該電謂：「外間盛傳比國與交戰國之關係將發生重大變化，但其變化之性質如何，則無法判明。官方對於此說，力守沉默態度，故無法予以證明。」所謂和交戰國關係將發生變化，無非指和德法英三國的關係發生變化。常識使我們相信，比國決不致于走德國的路線。設使這個傳說變成事實，則可能的推測，或爲比國放棄中立政策，加入英法陣線，俾英法得假道比國進攻德國。但假如這個推測成立，這道「變化」的實現，似乎也當在德國侵犯比荷的中立之後。

秋 行

端木露西

夜開始爬到了它邊沿的盡頭。黯澹的天幕徐徐地滲出了魚肚色的光亮，高空的雲層波浪似的向無際的天邊一陣一陣

的推行；終于從那迢遠的東方的雲隙裏射出了太陽的光芒，像幽暗的海浪中浮盪着許多金絲一樣。

一個要趕早車的人，她的睡眠是不會安甯的。當驚弱的朝陽第一次勇敢地抵着玻璃窗上的時候，我便從幽靜的夢裏驚醒了過來，恐懼的跳下了床，走到窗前，向着天空凝視；浮雲已漸漸的散了開去，天上變得淨碧清明；睡夠了的小雀在悲哀的秋天裏也沒有吐出一曲悽愁的歌；漫天的鮮豔，給這人世帶來一份生命的熱力。輕微的晨風吹拂過這個房間，房間在朝陽中顯得分外溫暖柔和——這是淺藍天裏的一個好天氣的預兆。

一切都不能改變了。晴天，有什麼藉口呢？一個人有時候在做着違反自己意志的事情的時候，恰如一個癡人懷着妄想，真有點兒希望着天給他一點幫助。但是，今天的天也不想「留」人啊。

房間裏的兩個人的心都是沉滯的，憂鬱溢漾在空氣裏面，苦痛鎖鏈着兩顆不甚康寧的心靈……我的眼睛躲避着他的目光，我真怕他眼中不言不語地抖動着的那股淡淡的神情，就像一條在靜穆的晚天裏的河流般的，在默默中永遠含着一股憤懣和哀怨，使人見了愁愁難抑。是的，他也沒有一點流盼過來的意思，祇是優婉地俯視着地面，或者呆呆地眺望着天空，他也在我的視線裏逃了開去。兩個人都不預備用一句語言來衝破這不易承受的默靜，提防別離的悽楚也許會像山罅間的瀑布似的傾瀉下來。

早晨是秋天的早晨。街道的顏色，路人的衣服，和微涼的薄霧，使人都覺着有秋絲飄浮在天空間。街車拉着我一步一步的跑去，我又彷彿看見秋在遠遠的天邊，那嫩江中的平

靜的雲花裏，湧出了感情來。然而……前面的那個人爲我帶着一件行李，（謝謝，行李是他給整理的，我自己永遠做不好這種事情）好像怕多呼吸一點空氣似的，——當他那種外表的漠然的情緒溶合在秋的悲哀裏，在背後的我看來，真感到他是顯得過份的鎮靜了啊！

車站上擁擠着人羣，喧囂的聲音轟地把我丟入了現實裏面，腦袋裏不允許再裝着一點雜亂的不愉快。他爲我去買票，衝進人堆去，在排列的人行中，竚立着，守望着售票處，啓開那一扇小小的窗門。我招呼着一個腳夫，拿我的行李放在檢查員的而前。檢查員看來是一個正派的人，嚴肅的向我們上下掃過一週，要在這一瞥中規定我的身份。在他面前站着的那個旅客，蹙着眉頭，疲倦和厭煩繃掛在一張沒有一點光彩的臉容上，機械的打開她的皮箱，做着一個旅客應該做的事情。檢查員用敏捷的手法老練地翻動着皮箱的每一個角落；一面用上司的口吻問：

「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到什麼地方去呢？突然，我感覺到了一個罪人被宣佈了酷刑似的，渾身急速地掣動了起來，喉管裏像給什麼塞了似的，但終于用澀澀的音帶說出了我的去處。但是，當檢查員再要知道我去做什麼的時候，我真有點兒討厭這個過份忠於他的職務的人了。我無精打采的，像一個臨終的病人交出他的遺囑一樣，將我的那件新職業的證件抽出來讓他看，我懶得再說一句話。他閃着輕蔑的目光，斜視着紙面上的字句——原來我是做着這樣一件不屬於富貴的團圓裏的工作的

人。

去買票的人沒有移動過一步。我從他腳跟凝神注望着他，一直到他的鼻部，又激動地拿我的視線收了回來；我不敢接觸他的眼光，我知道他該用怎樣地一付目光來回答我的監視，那也許會使我忽然改變決心，走一條相反的道路。一個多鐘點空虛的過去了；在這一個時候，世界對於這兩個個人真是太空洞了，我靈魂裏什麼都沒有，思想像一個死的水池，對眼前的事物一點都掀不起漣漪，人們在我的面前蠕動，吵鬧不休，我覺得祇有別人的生存。木麻對於一個虛空的靈魂就是一種幸福。

車子終於來了。人羣像狂風裏的浪濤向海灘澎湃般的湧上車去。中國人在這種場合裏面是世界最可愛的演員，每個人都富有天才。站在一旁的那位聰明的車站上的職員一點都不浪費他的情感，不動聲色的看着一車旅客們人擠行李，行李擠人的在喧嘩着；他面對着這樣一個精彩的舞台面，他完全是無能為力或者是不圖補救的模樣。客人們絕對的都放棄了他平時對於自己的估價或者自矜，用了豺狼的暴戾才佔到自己的座位——一塊連康熙字典都放不穩的地面。我緊縮着整個兒的身軀擠在一個角落裏，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下意識地有一種放下一付担子似的輕鬆。感謝命運的作祟，我將去開始安排另一個新的天地了。

要最後一次在這個地方留下一點寶貴的沾戀，我偷偷地凝視着他，一直到四條光芒接連在一起的時候。呵，他那炯炯有光的圓大的眼睛，流動在喧囂的熾浪裏，像一隻鑽針，

侵蝕了我的靈魂。突然，我感到更大的痛苦和一種不安和憐憫交合的情感，當我想着我必須使這個人為我忍受着苦痛的時候，我的眼眶裏滿含着眼淚。

「X，你回去吧。……：車子不知什麼時候開呢。」我感亂地說着；伸出我的軟弱的手，握別這人生旅程上忽然拆夥的伴侶。

兩顆晶亮的水珠子洗着他的眼眸，他的目光變得陰慘，我知道這是被一種過去的回憶所攪擾了的結果。他捏着我的手……：一層濃密的霧雷遮蔽着我的眼簾，景物在我面前模糊起來了。

他沒有走。他要守着車子開出去，盡一個送客者的全部的責任。悵悵潛流在我的每一個細胞裏，我是為着我以外的另一個人難受呢，還是為我自己？我簡直不能相信這一切的事實。……

車子開出去了。我揮着手說：「X，回去吧」。忍受着一切。將他消逝在車後一道飄飛舞起的灰色的煙霧裏，迎着前面的大道，我被慰撫在大自然的日光中，燦爛的金黃色的光耀召喚着我的生命之力，心靈閃爍在柔和的溫暖的光海裏，享受着天地的愛。

我離開了一個小團體，奔向一個更大的軍閥的世界去！

(二十八年十二月成都)

編輯後記

寫第三期「編輯後記」之前，我們先得向第二期的作者讀者，致最大的歉意。我們每篇排印的稿子，都經過三次校對，所以第一期上可說沒有什麼錯字。第二期上錯字較多，因為第二期付印時，正巧在廢歷年底，印刷所裏的工友急于告假回家，有許多地方不免排得草率，有的在臨時上板付印時，又被弄亂，以致印成後無法補救。事雖意外，但我們對此非常不安，仍希作者讀者原諒。

這一期陳之邁先生給我們寫了一篇「論中國的計劃政治」。「計劃」誠然已是一個時髦的名詞，但計劃能否實行，以及計劃以後是否按照這個「計劃」實行，是我們所應注意的兩個問題。陳先生在他這篇文章裏，雖未正面地批評中國的一切「計劃」，但却側面地提出了中國許多「計劃」的不合理的現象，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計劃與預算的脫節。我

們希望政府各方面的人物，都能看到這篇文章。

陳石孚先生現任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王一之先生我們在第一期上已經介紹過，王先生對於國際宣傳這一問題很注意。他寫過一篇「改進中國國際宣傳構方案芻議」，不久將在「外交研究」月刊上發表。他另有一篇「國際宣傳的三種姿態」，和本期所刊的一文是姊妹篇，將續在本刊發表。

端木露西女士的文字有她所獨具的風格；這篇「秋行」是一篇散文。

最後，讀者來信問本刊收不收外稿；本刊是公開的，歡迎投稿。但是稿件請勿過長，最好在三五千字左右，譯稿不收。

(編者)

新評論

創刊號目錄

強國的開端……………儲安平

縮小省區的具體方案……………胡煥庸

論歐戰中之外交戰……………周子亞

論歐戰中之經濟戰……………陳鍾浩

論歐戰中之宣傳戰……………王一之

歐戰對於日本經濟之影響……………劉燕谷

新評論

第二期目錄

論中國外交政策……………周子亞

沒有國書的使節……………沈昌煥

歐洲的墓碑……………許汝祉

論米內內閣……………金長佑

美日交涉中的幾個要點……………郭斌佳

日本之現勢及其前途……………楊玉清

漫談生死(散文)……………袁昌英